

恐怖与怪诞：政治权力结构之外的多余人

汤笑然

(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 100089)

摘要：流亡美国的前苏联作家多甫拉托夫 (Sergei Dovlatov) 的中篇小说《手提箱》通过私人物品来阐述日常小事，以回忆的形式描写了苏联“后斯大林时代”的日常生活片段，其中充斥着无目的的盗窃、醉酒等荒诞不经的行为。在强大的政治权力结构中，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表现出恐怖和怪诞的特征。国家权力渗透到方方面面，但是，强大的权力也展现出虚弱的一面。权力无法掌管人们的梦境、醉态和不正常的行为。他们游离于权力的边界之外，构成了反秩序反权力的空间，一个想象的狂欢世界。强大的国家权力要求一个有秩序的、合目的性的世界。而无目的的行事，消解了政治的功利性和目的性，本来应该成为政治主体的人民却成了多余人。

关键词：权力结构；多余人；恐怖

中图分类号：I106.4; D7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832-9317 (2023) 03-0044-04

DOI：10.12424/HA.2023.043 **本文链接：**<https://www.oc-press.com/HA-202303-044.html>

谢尔盖·多甫拉托夫 (1941-1990) 生活在苏联勃列日涅夫的时代，侨居美国前生活在彼得格勒 (圣彼得堡)。他的父亲是犹太人，他的生活经历坎坷，颠沛流离，做过牢房看守、雕塑工人、导游、编外记者、作家秘书等，因为“不适合搞意识形态工作”而被排挤，也因为当时严厉的书刊检查制度而无法发表和出版自己的作品，无法进入作协。1978年37岁的多甫拉托夫移民美国，此后一直处于流亡状态，直到1990年去世。

小说《手提箱》(The Suitcase) 于1980年在纽约写成，出版于1986年。在序言中，多甫拉托夫交代这是他离开苏联时随身携带的唯一一个箱子，里面装了八件私人物品，都是日常衣物，西装，衬衫，皮鞋，袜子，手套等等。到美国纽约后就被遗忘在壁橱中，直到四年后因为一次与儿子的游戏发现了它，才第一次打开。看到这些物品，作者说，这是“我在故乡生活的全部”，每一件物品都有一个故事，一共八篇独立的小故事，构成整部小说。作者将自己的叙述方式称为“伪纪实主义”

(Псевдодокументализм) (张建华, 2003)，用纪实的形式表现一种艺术真实。

“手提箱”是一个“记忆的箱子”，透过这几件物品，可以看到一个关于苏联社会的微缩世界。每一件物品都有与之相关的一些回忆片段，虽然在叙事上情节并不连续，但是，同一时代的社会背景、人物状态、生活方式、言谈举止是统一的，是每个小故事的背景和底色。

小说中的人物总是有两种日常化的行为——盗窃和醉酒，这成为小说中人物的一种日常习惯，在《钦差大臣的矮靴皮鞋》一篇中，作者开篇就承认了“我”的盗窃行径，“这双鞋是偷来的。”不仅如此，盗窃成风，恣意蔓延，“没有不偷的东西：瓷砖、石膏、聚乙烯、电动机、螺栓、木螺钉、电子真空管、棉线和玻璃。”这些物品都不是日常最为需要的食品或日用品。并且这里的描述没有主体，而是强调了没有不偷的东西，到处都存在盗窃的行为。主体是匿名的，说明这些行为是无意识的，已经日常化。作者回想起来感到惊奇，但当时身处其中却并未察

作者简介：汤笑然，女，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俄罗斯文学。

觉，连自己也参与其中。

作者写到，“这些盗窃行为往往带有形而上学的特征。我指的是没有任何明确目的的完全莫名其妙的盗窃行为。我相信，这种现象只会发生在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在强大的国家政治权力结构下，日常生活表现出来的怪诞和恐怖的特征。

有人会从小工厂顺路拎走一桶水泥浆，在途中水泥凝固了，于是窃贼在离家不远处当街扔掉了水泥块。有人从宣传站偷走了选举箱，有人从上司办公室拿走美国演员的半身塑像。而文中的主人公“我”，声称自己“干起这种事来实用得多”，主人公参与了一次罗蒙诺索夫雕塑的制作，在雕塑揭幕仪式的宴会上，和彼得格勒的市长同席。市长在桌下偷偷脱了鞋，就是这双矮靴皮鞋，市长的脚微微颤动，仿佛在弹钢琴，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此时，发现这一幕的“我”，“不知是被压抑已久的不同政见开始产生作用，还是体内的犯罪本性蠢蠢欲动起来，抑或自己被神秘的破坏力量所驱使，”总之，不知道原因和目的，当时那一刻，“我”伸出脚，缓慢而不被发觉地把那双鞋钩到了自己这边，接着故意抖落手帕去捡，迅速把这双鞋藏进了自己的皮包中。即将要上台参加揭幕的仪式却找不到鞋的市长，急中生智，说自己有点儿不舒服，需要休息一会儿。于是保镖迅速行动起来，将房间清场，于是仪式中断了，纪念雕塑也被上层斥责为不敬伟人，最后被撤下。无目的的盗窃行为，与这一场目的明确的政治仪式形成了讽刺的对立。

另一篇故事《防寒帽》，讲述了儿童玩具厂大批财产被盗的事件，厂子里两名勤杂工挖了一条地道，通向厂子外面的大街。这两个人给玩具上满发条，往地道里一摆，那些熊、坦克、掘土机，就自己朝外走去，源源不断地一批批离开工厂。雕像被撤下（倒塌），而玩具集体出逃（站立），在强大的政治结构中成为一幅荒诞的图景。

盗窃破坏公共利益，是一种犯罪行为，“犯罪是一种个人打破连结自己与他人的社会契约并对自己所在的社会宣战的举动。”（福柯）盗窃成风，说明社会处于一触即发的混乱的内战状态，每个人

都有可能在某个时刻成为罪犯——社会敌人。而另一方面，强大的权力结构牢牢监禁着社会成员，权力的触手深入社会各个方面，这是一种普遍的规训——监禁机制，每个人都被权力的恐怖所笼罩。盗窃这样的犯罪行为构成了对这个权力机制的反抗。

另一种充斥整部小说的行为，就是醉酒或者酗酒。

在小说中，不论身份地位，人人酗酒，这是日常生活中普遍的状态。每个人即使参加隆重的集会，衣兜里面也是鼓鼓囊囊的，装着酒瓶子，以图没有人注意的时候抿上一口。人人不论男女老少，都在酒棚门口冒着严寒排着长长的队，日日买醉。“我不禁琢磨，全俄罗斯究竟有多少这样的啤酒棚啊？每天有多少人死去又活来啊？”在《驾驶员手套》这一篇中，主人公看到这长长的队伍，感受到了恐惧。“面对这些痛苦不堪、郁闷寡欢、半神经错乱的人，我能说些什么呢？”无论是衣衫褴褛者，还是穿着铁路职工制服的人，还是知识分子模样的人，都在队伍中，沉默地等待着，“在场的人面临一个共同问题：喝点酒来解昨日宿醉。”

主人公之所以会来这里，是应朋友的要求，装扮成沙皇的模样，拍一个电影镜头，表现这座城市的缔造者彼得大帝置身于今天的彼得格勒时，所感到的陌生、惊诧和厌恶。他的朋友要求他激起人群之间的激烈冲突，表现迷惑与不满，愤怒地质询。在酒鬼中间，制造帝王被贱民纠缠的场景。然而，当“我”出现在买醉的队伍中时，没有一个人感到惊奇，“我”被夹在衣衫褴褛者和铁路职工之间，我的长剑末梢顶住了知识分子的大腿。人们自然而然地称“我”为“沙皇”。只有在导演朋友扰乱大家的队伍时，才引起骚动。因为他打乱了大家排队的秩序。

酗酒成风在文中，展现了一个混乱无序的社会中一种普遍的自我迷失状态和集体的狂欢。排队的人群都是酒鬼，沉默不语，遵守秩序，除此之外，其他事情都不重要，甚至不会对打扮成沙皇模样的“我”有任何的好奇和惊异。他们处于醉态中，处于酒醉制造的一个梦境或者说疯癫状态中。对沙皇

的突然显现，感到毫无新意。每个人都冷漠而又混沌地对待生活，这背后是巨大的历史力量，国家权力深刻地深入民众日常生活方方面面，“伟大的国王被笼罩在虚假的苏维埃现实中”。“我”扮演的沙皇，没有引起应有的效果，没有民众的惊奇或戏谑，只有无所谓，或者自然而然的认同。权力的表演失败了，这样的戏剧性被忽视，被消解在日常的怪诞中。

导演原本对人群日复一日沉迷于酒醉感到十分悲痛和气愤，像是这个疯狂时代唯一一个清醒的知识分子那样恼怒地骂道：“混蛋，你们酗酒毁掉了俄罗斯！你们彻底丧失了良心！大概天不亮就灌满了酒吧！一起床就喝酒，没人样子……”然而当“我”问起他要多少时，他立刻平静下来，参与到了买酒的行列中，毫不犹豫地加入集体的狂欢中。当他喝了酒，就说：“这就是公众！人民就是这样！我甚至害怕了。”他也是这公众与人民的一分子。

无目的的盗窃，酗酒的狂欢，在政治权力结构内部开启了一个反权力的空间，可以使人退避其中，无视戏剧化的场面，对荒诞的图景毫不惊奇，构成一种无声的对立，无回应的反抗。然而这样的反抗非常虚弱，最后总是以失败告终。

回到这部小说的开头部分，“我”带着这个尘封记忆的箱子，载有过去三十年的生活，几年间被遗忘在壁橱当中，直到无意间打开它，这种恐怖与怪诞的记忆夹杂着乡愁才重新涌现。人与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由于作者的遗忘和逃离，他也可以被看作为一个“多余人”。“多余人”是俄国文学传统的人物形象，普希金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塑造了第一个多余人，是俄国贵族革命时

期开始觉醒但找不到出路的进步贵族知识青年的典型。此后，多余人在文学中不断再现，如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屠格涅夫的罗亭等等，他们感到内心与现实的断裂状态，面临自我的迷失与惶恐，却又对社会的疏离和时代的混乱无可奈何。从贵族到地主，从知识分子，到普罗大众，这一形象不断得到扩写。

我们在多甫拉托夫的小说里可以看到，在强大的权力结构中，公众应该是权力的基础，权力的触手伸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却无法管控他们的梦境、醉态和荒诞不经的行为。他们身处国家政治权力的结构之中，他们是权力制造出来的不正常的人。盗窃和酗酒，看似匿名性的行为，恰恰反映了这种行为的普遍性，恰恰是他们在强大的政治权力结构中打开的另一个空间，一个逃逸的空间，在这个具有超现实意味的空间中，可以感受到犯罪的快感或酒醉后自由的幻觉。这个被制造出来的空间与权力空间的边界并不稳定，他们游离于权力的边界内外，在想象的狂欢世界，成为权力结构之外的多余人。多甫拉托夫身处美国，反思俄国社会，在这个意义上，作者同样既在边界之内，也在边界之外。

参考文献

- [1] 福柯. 惩罚的社会. 钱翰译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 [2] 谢尔盖·多甫拉托夫. 手提箱. 刘宪平译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 [3] 张建华. 荒诞的存在与本真的叙事——多甫拉托夫的后现代主义短篇小说述评 [J]. 外国文学, 2003(06): 18-23.

Horror And The Uncanny : The Superfluous Man Outside The Political Power Structure

Tang xiaoran

Abstract: Sergei Dovlatov, an exiled Soviet writer living in the US, presents his novel *The Suitcase* as an evocation of everyday life in the "post-Stalinist" USSR, marked by random theft, drunkenness and other absurdities. The everyday life of ordinary people is marked by horror and the uncanny within the powerful structure of political

power. The power of the state permeates every aspect, but the mighty power also shows a weak side. Power is not responsible for people's dreams, intoxication and abnormal behaviour. They go beyond the limits of power and constitute a space of anti-order and anti-power, a world of imaginary carnival. Powerful state authority demands an orderly, purposeful world. And by acting without purpose, by dissolving the utilitarian and purposeful nature of politics, the people who should be the subjects of politics become superfluous.

Key words: power structure; superfluous man; the uncanny